

元代新安理学家唐元考论

唐 宸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唐元是徽州“唐氏三先生”之一,历任平江路儒学学录、建德路分水县儒学教谕、集庆路南轩书院山长等职,高年以徽州路儒学教授致仕,时人誉为“东南学者师”。他的《易传义大意》、《见闻录》等理学著作均已散佚,但雪泥鸿爪间仍能窥得其旨趣大概;诗文集尚存《筠轩集》十三卷,展示了他纤徐典雅的文风和丰缛清润的诗风,在当时即已受到虞集、方回等人的赞赏。唐元等一批元代新安理学家、文学家,继承并发扬了程朱理学,为徽州学术与文学在明清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唐元;筠轩集;新安理学;唐氏三先生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2)04-0011-05

唐元(1269-1349),字长孺,号敬堂,学者称“筠轩先生”,徽州歙县人,元代新安理学家、文学家。唐元与其子“白云先生”唐桂芳(1308-1380)、孙“梧冈先生”唐文凤(1347-1432)皆以诗文名于时,被誉为“小三苏”。三人皆著作等身,而《筠轩集》、《白云集》和《梧冈集》中所存者仅十之二三而已。明代徽州文献学家程敏政曾合编校定为《唐氏三先生集》,有正德十三年(1518)徽州知府张芹刻本传世。清乾隆间,三集皆单行收入《四库全书》别集类。

元、明二朝,“唐氏三先生”在徽州颇为著名,而他们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和家学渊源,今人尚缺少专门的研究。兹据相关文献考证三先生之一唐元的生平交游、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情况,以惠学者。

一、唐元的家世生平与交游

据正德刻本《唐氏三先生集》附录的三先生行状、墓志铭可知:唐元的始祖唐承晷,是宋参知政事唐介的曾孙,宋南渡后为歙州军州事,子孙遂为新

安人。承晷传九世至廷隽,廷隽无嫡后,以婺源严田李玘之子李桂三继传。严田李氏本为唐皇室之后,其始迁祖李佺,为唐宣宗子昭王李汭第三子,避黄巢之乱于篁墩,易名李京,后卜居界田。传三世,李德鸿留居界田,李德鹏迁祁门新田,李德鸾迁婺源严田,此即徽州谱牒史上著名的“三田李氏”。^[1]德鸾传十世至桂三。桂三字常道,号梅癯,治《周礼》,于“理学诸文多所发明,具载《六典精义》”,^[2]过继后易名唐虞,是为唐元之父。

唐元既出诗书之家,自幼受程朱理学熏陶。少时与洪焱祖、俞魏卿为笔砚交,里人并称“新安三俊”。三人“徜徉山水间,洗濯磨淬,婆娑嬉游,未始不孳孳以蒞学为务。戏谑褻狎,不一出诸口。”^[3]蒙元灭宋后,科举废止达30余年,江南文人多成游士。三人在干谒名公硕儒之余,恒心嗜学,闻名乡里。时徽州路总管孟淳初见唐元,十分器重,赠诗曰:“新安三俊子其一,气貌清腴文字工”。^[3]因为早年“不识治生理”,^[4]唐元“屡阨衣食”。36岁,以所作诗54篇投谒被誉为“江西诗派殿军”的方回,方回欣然命其

收稿日期:2011-11-24

基金项目:上海大学第五届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HUCX112061)

作者简介:唐 宸(1988-),安徽歙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文献。

集为《艺圃小集》，并在序文中称赞其诗“所以可人意者，格高也……近人之学许浑、姚合者，长孺扫之如秕糠，而以陶、杜、黄、陈为师者也”。^[5]此后，唐元“梦寐间不敢忘先生之训”，^[6]“奋迅剡切以诗自鸣”。^[7]延佑二年(1315)，元廷恢复科举。消息传到徽州，46岁的唐元一度“萤窗雪案”，学习应试文章，却4试有司不利，于是愤弃举子业。元廷科举规模不大，对汉人、南人又存有歧视，这使得当时大量文人转而从从事吏事。当时，虽有数举不第而恩授教授、学正和山长之例，但对汉人、南人也存在年龄上的限制。唐元最初训导吴庠等乡校，生活较为清苦。58岁时，得江浙行省授平江路儒学学录之职，在职兴文教，交游东南名士。65岁，迁建德路分水县儒学教谕。68岁，任集庆路南轩书院山长，声名已盛于金陵。寻以徽州路儒学教授致仕，退居歙县乌聊山下，“益以文章自任”，名重东南，被誉为“东南学者师”。“每侯伯下车，必先请见。四方大夫士子过其境者，必询其起居，即其庐而礼焉。”^[3]上门求文者也是络绎不绝，填塞阡陌。

唐元自谓“晚始知学，而圣言浩若烟海，常惧精力就衰，卒未有成”，^[8]“恨平生未见之书尚多，吾岂甘衰老而自弃哉？”^[9]因此，他好学老而不倦，晚年“须眉纷白，神采粹温。老于其乡，一人而已”。^[3]至正九年以病卒，得年八十有一。临终嘱薄葬，又作“视死如归，无忧无辱。海水还源，本来面目”16字诗，端坐而逝。其自作像赞曰：“生不恃物，晚而劬书。庶几谨畏，遗体无污”，^[10]可以说是对其一生的写照。

唐元平生交游广泛。现考《筠轩集》诗文所及者，即有：方回、曹泾、龚璠、张起岩、王士熙、吴师道、杨刚中、贡师泰、李桓、杜本、郑元佑、汪巽元、陈栎、汤炳龙、杨敬惠、洪焱祖、俞魏卿、郑奕夫、郑玉、程文、危素、毕祈凤、牟应复、马昂夫(薛昂夫)、郭麟孙、夏溥、刘致、盛则轩、程益、陈方、艾庭晖、俞肇、鲜于去矜、蒋师文、江光启、黄志斋、朱克用、朱文选、赵孟威、夏希贤、夏泰亨、徐舫、胡初翁、孟淳、卢摯、于泰来、孙国瑞、庄蒙、吕广文、汪逢辰、尤拔、吴彬、汪德玉、程国宝、鲍元康、汪幼凤、周彦明、鲍椿、许洪寿、程植、孙岩等。这些人大多是当时身处东南一带的名士，以及诸路儒学教官或书院山长。唐元的交游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士人在干谒交际和从事教业上的真实状况，对考证相关人物的生平也有一定的价值。

唐元生平所著，计有《敬堂杂著》、《思乐杂著》、

《吴门杂著》、《分阳杂著》、《金陵杂著》和《老学藁稿》凡“三千余篇”，以及理学著作《易传义大意》十卷、《见闻录》二十帙，可谓著作等身。今仅存《筠轩集》诗文十三卷，有《唐氏三先生集》本和清《四库全书》本。从版本上看，前者即后者的底本。《唐氏三先生集》的序跋和附录中，保留了大量有关唐氏三先生的文献，是今人研究三先生和元明徽州文学的重要材料。

二、唐元的理学思想

元代是新安理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徽州士人视程朱之学为家邦之学，又都重视家学渊源，因此几乎无人不浸染理学。唐元幼承过庭之训，私淑朱熹，尤精于《易》。他认为，“《易》至朱程无余蕴矣”，但是“二家多不及象”；“儒先於一爻二爻间有总论”，然而“六爻每无总论”。因此，悉数考证陈备，凡“互有不同，则疏于卦末”，成《易传义大意》十卷。^[3]此书今已不见传本，清朱彝尊《经义考》卷四十四即将其列为佚书。

“易者，象也。”“八卦以象告”，可以说易学是倚于“象”而成的学问，但历代治易学者虽然都秉承“以象说易”的传统，却因门派分衍而方式有别。朱熹、二程皆重易之“理”，乃为治理学而治易学，本意在发扬儒学。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后，推行全国，难免就在象数之学上遗留了一些问题。后人以“理”、“象”、“数”三分易学，便是受了这样的影响，而程朱之学也容易被曲解本真。一些学者遂追溯邵雍的象数之学，对程朱的易学予以推进。其中，唐元的友人夏溥出象山之门，以治《易》象闻名；乡友胡炳文认识到程朱在“象”学上的缺陷，尤为重视征引阐发，统一义理与象数两派，作《周易本义通释》诸书。虽然唐元的《易传义大意》已亡佚，但他重视象学与义理的合一，强调对六爻总论的完善，是可以窥见一斑的。胡炳文评价《易传义大意》一书“本本分分，亭亭当当”，^[3]亦可看出唐元此书是对程朱易学的客观补充。

唐元平生喜竹，谓其“霜凌雪厉，独正不惧，即吾志操之坚贞也”。^[9]他在《董氏存诚堂记》中以“乾之九二”论诚心之道，在《徽州路重建谯楼记》中以山水卦形记建楼始终；在《山林读书所记》中以“物得其所”引出“一心在理”、“持敬”修诚之论，在《一斋记》中由“天一”之数推及人伦终始、修心敬静之

说;其《歙县儒学修造记》以“天下惟理最大”开篇,《徐至刚字说》以“义”制刚直收尾……皆持论中正,不一而足。这种“正色坐紫阳”^[11]不为异说的态度,是当时从事教职的教官和山长们所共有的。唐元晚年著《见闻录》20余秩,“理学渊源,名物巨细,事无不考,问无不知”。^[1]虽然此书亦已散佚,但从书名可以看出,唐元当是重视以主观经验和客观名物来阐述理学的,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正途。至于探究“理学渊源”、“事无不考”,从治《易》的角度看,不由令人想起清人王夫之的易学。《四库总目》称唐元“于经术颇深,其议论亦不诡于正”。^[12]可惜其理学著作今皆亡佚,已难深入探究了。

三、唐元的文学创作

唐元是以程朱理学出身而治文的。在经历了科举的失利后,他转而攻古文,“绌绎经史百家,沉潜韩柳欧曾,于鹤山爱其博洽,自以为临邛衣钵”。^[13]每每“五更孤枕,潜思密运,不竣笔札,以腹为稿”,于是“文从字顺,滔滔汨汨”。^[1]唐元以“临邛衣钵”自居,道学文章皆以魏了翁为师。魏了翁之文醇正有法,且立意高远、思想深刻;语言流畅,而纾徐曲折、出乎自然。今观唐元《筠轩集》中《金陵祭杨待制文》写得高古整齐,《贄见梦臣张侍御书》则纾徐而典雅,其他序记铭跋也都议论平实而富有文采,尤可谓得鹤山真传。此外,其《太原王才塑工赞》描摹生动传神,《四库总目》谓其“亦可以补史所未备”;而《跋李伯时摹刘商观弈图》和《舟喻示儿桂芳》都写得短小凝练,后者全文不足160字:

日游吴会,买舟江浒。篙师嗜利而好招人也,偃仄委琐,坐卧弗舒,炎熇上压,沴气下蒸,不呕则泄,同舟之人惧焉。晚泊马目山下,贷舟老叟,大可容千斛,深房高榻,枕簟悉安。余始知善用大者不知其为大,而器小者自不可掩也。汝由是而知务学矣!浮躁浅露,其量几何?深藏不市而恢乎有容者,君子之道也,作《舟喻》,示第五儿桂芳,且将以自箴焉。

唐元白天所乘小舟,因船家贪利多载,以致舱内污浊,旅客叫苦不迭。夜晚所登大船,人少舒适,因而坐卧甚安。这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唐元却从中看出了“善用大者不知其为大,而器小者自不可掩也”的事实,并悟出了“务学”应当“深藏不市而恢乎有容”的道理。《易·序卦》云:“有大而能谦,必豫。”唐元以舟所喻的道理,正是君子的重要品德。

文章前半部分叙事,在描述了小舟的狭窄肮脏后,仅用“深房高榻,枕簟悉安”8字便衬托了大船的宽敞惬意。后半部分抓住“大”和“小”的不同表现,点到即止。在说理的方法上,因事生教,寓理于物,完全不是空洞呆板的说教。最后以“且将以自箴”结尾,使得父子处于平等地位,更显谨慎自然,可以说是一篇难得一见的说理文章。

《四库总目》在评价唐元的文章时说:“盖其始终当元盛时,故所作多和平温厚之音,极为虞集所推许。”^[1]唐元致仕后,求文者众多,故文章遍传海内。文坛盟主虞集读罢,亦不由感慨曰:“近睹《郑夫人行实》,佳甚。吾恨不识唐公之为人。”^[13]惜唐元的《郑夫人行实》已散佚。王士熙读唐元所谒诗文后,连称“作手”,并赠“乘槎深夜问支机,天女流梭舞凤飞。回首人间金粟尺,剪灯愁制五铢衣”一诗,^[1]以“金粟尺”誉其诗文,张起岩、杨刚中、李桓等人皆追和成轴。夏溥也说:“唐君之文高古整齐,令人读之不休。邻邦何幸,有此手笔!”^[13]夏溥承家学渊源,博通经学、工诗文,新安理学家郑玉、赵昉等人也都曾向其问学。当时的著名散文家贡师泰则称唐元“文字有法度,诸人不可及。”^[13]贡师泰的文章,时人誉为“气充而能畅,辞严而有体,讲道学则精而不凿,陈政理则辨而不夸。”可见,唐元的文章在当时就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唐元自谓平生“结交半老苍,不揖无诗人”。^[14]他36岁时以诗谒方回,得到了方回“格高”的赞赏。从方回的序中可以看出,唐元所投之诗多为拟陶之作。其中,五言古诗《艺圃》三首之二曰:

旧种竹数十,生笋已满园。
今年笋更繁,戢戢穿邻垣。
山童鬪烟雨,便欲供朝餐。
独不忍馋口,保此青琅玕。
物微志则远,当异今日观。
平生迟暮心,与尔同岁寒。

全诗风格淡远,可谓深得陶诗意境。诗中“青琅玕”典出杜甫“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青琅玕”之句,末二联则与杜诗“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十载江湖客,茫茫迟暮心”异曲同工,有唐诗风韵。《艺圃》3首虽然出于对陶、杜的模拟,却也融合了宋诗的风格和徽州的田园风趣,因此作为唐元早期诗歌的代表,奠定了他诗歌的总体风格基调。《元诗纪事》引《新安文献志》说:“筠轩以所作谒虚谷,虚谷读此三诗,亟加叹赏。”方回对唐元早期诗歌“格高”

的评价,指的就是这一种本诸陶杜、兼学唐宋的风格。

唐元晚年在《艺圃后稿自序》中回忆谒诗方回一事时说:“遂闻古今作者格有高卑之异,知其说当自得之心,然博读静思其梯级也……窃谓自得于心者,无法之法;博读精思者,有法之法。”其《艾幼清汝东樵唱诗跋》又云:“昔人有言,读书万卷而不用于诗,畏其义博而辞溢也。夫诗有别材,本于性情,触物而发。故曰:‘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然观少陵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益知学诗人肺腑,非得古今灌溉,理义融会,则如貌枯语涩,于善养生人不类。”唐元悟出诗格有高卑、诗情需学问、理义灌溉的道理,遂注重以精思治学入诗文,以品格治心求道理。其《读子敬龚先生江东小稿》云:“谢韦向上无圭角,濂洛方来以道鸣”、“坡公门下无多客,工部毫端有万牛”、“五更孤枕六旬客,二句三年双泪流”,意识到东坡之诗难学,杜甫笔力则更是雄浑,向他们学习诗法,不仅需要博学精思,更需要苦吟精进。他的这种“兼学唐宋”而有所侧重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时部分文人“宗唐”却沿袭了中晚唐纤弱之风的弊病。其《与友人论诗因成五言奉寄称隐府判》云:“有客为余言,诗也何所用?温柔养性真,弦歌资咏诵……骚雅正大宗,汉魏亦群从。陶韦尚冲澹,黄杜千钧重。平生三千篇,莎迳咽寒蛩。”杨刚中以“诗思腾涌,如万斛泉不择地而出”来称赞唐元的诗,^[3]而作诗达到诗思腾涌而又冲澹雄厚的境界,无疑是需要苦寒磨练的。

唐元仕途不显,常有意归隐山林,自谓“我本山中客,见山如家人”,^[15]其《黟山绝妙玩不忍去》、《九月二十八日督校廩如东阁偶偕同游登西岭作》、《题吴维申寿藏》、《送许方所主簿》、《星源王氏双溪诗》、《野鹤栖于树儿童误指为鹤者感而有赋》等诗作,都流露出避世归隐的情愫。他每每感叹“今人自今人,安得古人调”,^[16]因而多复古拟古之作。如《艺圃》、《忆昔行》、《归来乎山中》、《城中少佳树》等,朱文选称为“盘折老硬,无纤巧态”。^[3]他生平多羁旅坎坷,亦十分关心百姓疾苦,这反映在《八月八日过嘉兴捕蝗行》、《七月初三日大雨十五韵》、《田家苦》、《舟行书事古体》(其四)、《客斋感兴》(其四)等诗作中。可以说,唐元的诗歌创作反映出有元一代徽州甚至整个江南文人的特殊处境。

唐元晚年退居讲学于歙县槐塘,朱升、舒颀等人均师礼之,“御史程君光道、山东进士陈子恭、江

浙进士周可仁皆其徒也。”^[3]舒颀谈到唐元的诗文时说:“文章学问为时所宗……所谓充然浑然者,当不在汉唐下。诗尤高,丰缛清润,有台阁风。”^[17]朱升之子朱同亦称其“诗文滂沛敷腴,不事险涩”。^[18]门人陈浩则称:“筠轩先生以文章行义为士轨式。”^[19]当时歙县的谚语亦云:“凡入城府,不之东郭见潜夫(洪焱祖),则之南门见长孺。”唐元卒后,朱升作挽诗曰:“紫阳山下小柴门,每忆童年拜隐君。乔岳岩岩瞻寿相,长江浩浩读雄文。衮衣不独缘稽古,宦学何时见策勋。千载藤溪风月在,直须驥子表高坟。”^[20]乡里后学无不受唐元浸染,这对徽州明初诗文的兴起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后世文人对唐元也不乏尊崇。文献学家程敏政在《唐氏三先生文集序》中说:“筠轩生于叔季,私淑考亭,仕不大显……筠轩之文纤徐而典雅,有汴宋前辈之风。故元名公张起岩、王士熙、吴师道诸君子皆盛称之。诗则含蓄而隽永,不作近代人语。虚谷方公为之序,美其格高,世以为知言。”^[21]永乐朝侍读学士王达也说:“予阅筠轩先生长孺唐公诗文,辞理条畅,不假雕镂,浩瀚滂沛,浑然天成。得临邛衣钵,有宋季诸儒之气象。”^[22]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翁方纲谈到唐元《筠轩集》时说:“新安为朱子之乡,故其议论绪言颇津逮朱门。在元人著作中颇为近正,应抄存之。”^[23]^[807]也对其诗文的价值予以了充分肯定。

总的来说,唐元的理学旨趣体现出程朱理学在有元一代的发展,诗文创作则表现出“恪守程朱、毫不逾矩”的徽州时代风格。其子唐桂芳在其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清新流丽、格律高古的诗风,达到了元明间徽州文学的最高水平。^[24]^[32]唐元等一批元代新安理学家、文学家作为当时徽州士人中德高望重的领袖,对继承发扬程朱理学、开辟明清徽州学术与文学的风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中华书局2003年影印之《四库全书总目》脱“极为虞集所推许”一句,据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筠轩集》提要补。

参考文献:

- [1]李向荣.三田李氏重修宗谱[Z]//谢东荣,鲍国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2.
- [2]唐元.跋先君子梅癯先生讲篇后[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3]朱文选.元故新安郡博士筠轩唐先生行状[M]//程敏政.唐氏

- 三先生集;附录.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4]唐元.病后杂书[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5]方回.唐长孺艺圃小集叙[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卷首.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6]唐元.艺圃后稿自序[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卷首.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7]杜本.元故徽州路儒学教授唐公墓志铭[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附录.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8]唐元.筠轩记[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9]唐元.竹林读书所记[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10]唐元.筠轩先生小像自赞[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附录.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11]唐元.送尤山长归浮梁[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12]四库馆臣.筠轩集提要[M]//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13]唐桂芳.跋筠轩先生文集后[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附录.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14]唐元.前韵奉谢汪璜隐兼呈腾远公[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15]唐元.暇日登姑苏古城望灵岩诸山作[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16]唐元.哭亡友潜夫洪主簿[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17]舒頔.书白云文集后[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卷首.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18]朱同.教授唐元传[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附录.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19]陈浩.白云集略序[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卷首.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20]朱升.读杜君所撰唐老先生墓志铭谨书小诗以旌哀仰之意且以泔江故事望吾仲实也[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附录.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21]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序[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卷首.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22]王达.唐氏渊源录序[M]//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卷首.1518(正德十三年)刻本.
- [23]吴格.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
- [24]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高 焕

Textual Research on Xin'an Neo-Confucian Tang Yuan in Yuan Dynasty

Tang Ch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200444,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masters surnamed by Tang, Tang Yuan has served successively as Confucian assessor in Suzhou, educational instructor in Fenshui, Nanxuan College dean in Nanjing and so on. Later, he retired from the position of Confucian instructor in Huizhou and was praised as "Tutor of All Scholars in Southeast China". His Neo-Confucian masterpieces such as *General Concept on Changes* and *Record on All One Saw and Heard* have already been lost. But through tracing back the scattered sources, the purport and the framework could be acquired. The current existing poetry collection entitled *Bamboo Chamber* with altogether thirteen volumes has demonstrated his soothing and elegant style of writing as well as his rhetoric and gentle poetic style, which was already appreciated at that time by Yu Ji and Fang Hui. With Tang Yuan included as a member, a group of Xin'an Neo-Confucians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ose men of letters hav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Neo-Confucianism,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Huizhou academy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Tang Yuan; *Bamboo Chamber*; Xin'an Neo-Confucianism; three masters surnamed by Tang